

李永东 著

ZUJIE WENHUA YU
30 NIANDAI WENXUE

租界文化与 30年代文学



上海三联书店

租界文化与 30年代文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租界文化与 30 年代文学/李永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9

ISBN 7-5426-2375-3

I. 租... II. 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708 号

租界文化与 30 年代文学

著 者 / 李永东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范峭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6

ISBN 7-5426-2375-3/G·796

定价: 25.00 元



李永东 1973年生，湖南郴州人。

2002年6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五年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西之辩》（与谭桂林等合著）即将出版。

序

孔范今

这些年,学术著作的出版可谓盛况空前。但在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的所谓学术著作中,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并不多。所以,每当读到一篇好的文章或读过一部好的著作,就会格外觉得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租界文化与 30 年代文学》,是李永东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以为,它就是这样一部好书,是一部堪称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创辟之作。一年多以前,还在其成稿的过程中,我就有幸得以先睹为快,当时即为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构想所感动,大有雏凤清于老凤声之慨。眼前的这部书稿,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用近一年的时间悉心修订的结果,比起原稿来,新锐之气未见稍减,但笔力更集中,论析更深细,自然是更为精到也更为沉稳了些。我相信,这部书稿的面世,定然会因其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份新贡献而被人们关注。

《租界文化与 30 年代文学》一书最基本的贡献,就在于它首次提出了“租界文化”这一据以建构全书的核心性概念,或者说对“租界文化”这一特异性文化空间给予了特别的指认与关注。这实在是做了一件很见眼力、于推进现代文学研究大有裨益的事。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问题。相对于往昔更多地关注于思潮、流派研究的倾向而言,近十余年来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生成关系研究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因为正是对这一对象领域的开拓,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这一角度(当然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角度)上,显现了对长期统驭人们头脑的那种中/外、古/今简单化文化认知模式实现突破的可能性,在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文学生成内在机

理的复杂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若细究起来,却又觉得有些不足。总的看来,这类研究大多是着眼于对某一地域如荆湘、秦晋、齐鲁、浙东等地文化个性的辨析及追根溯源的探究,落实到文学研究上也大多是对其文化内涵和审美创造的差异的辨析,也就是从地域文化根性的差异上作出较前更为切近对象的阐释。这种对原生性文化“知识考古学”式的发掘和现实辨析固然不可或缺,可是却并不能解决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变革中新的文化区域或曰文化空间的生成及其意义的阐释问题,譬如如何看待对峙中的京、海派文化,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所谓京派、海派文化,既然也以地域为指称的标志,自然仍归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但是,它们又具有不同于传统地域文化界分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的认识中,对文化地域的界分或者对某一人、某一现象的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指认,其文化特征总是与所由生成的某一地域相一致。然而在现代对京、海派的指认中,问题却变得复杂起来,这在对京派成员的圈定中尤为突出。其重镇人物大多不是北京人或京城文化圈的人,譬如说沈从文是湘西人,李健吾是山西人,汪曾祺是江苏人,师陀则是河南人,而且他们自 30 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居住在上海(对师陀的京派身份认定有分歧,但我还是坚持将其划在京派范围内的,尤其是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果园城记》和《无望村的馆主》等作品,京派味道则尤为浓重)。而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又都颇具乡情乡思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怎么说也和京城文化搭不上界。更有意思的是,像老舍这样土生土长于北京,作品又特别钟情于京味文化表现的名作家,却在所谓“京派”作家的圈定之外,这岂不怪哉!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对所谓“京派”的认定,原本就不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理解中形成的,它的出现,实则是在全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空间中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自有其独到的原则和意义。

至于“海派”表现出的却又是另外一种复杂。从地域属性来讲,它倒是名实相符,所谓“海派”文化,就是现代大都市上海的一种文化特性,其代表人物也大都生活于上海。但若从文化的生成特征上看,很重要的一点却又常常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与传统的的地域文化的原生性相异,它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次生性的特点。而且应该看到,正是这种

新型的文化及其所由生成的文化空间,恰恰是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中最具现代性意义的历史、文化空间与文化表征。在现代的地域性文化研究和文化空间研究中,是更应予以关注的对象。上海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形成,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独特性的集中表现。与内地城市以自身嬗变的方式向现代化过渡不同,它的形成发展则是另起炉灶的结果。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春秋》中对此已有明见:“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租界,这块西方资本主义的“飞地”,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与管理、观念与文化等方面几乎是全方位的移植,使西方世界的一切立体性地在十里洋场变成了现实。随着“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和租界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由其掣动所致,终使上海变成了史所未有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使其能够在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人说,“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一把钥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陈旭麓:《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所谓海派文化或者如人们所说的“上海气”并不就是租界文化,但说它是由租界文化滋生的结果,却是不该有什么疑问的。对于海派文化的基本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论争到当代学术界的诸多专述,已臻于明论,不想就此多嘴。我想要多说几句的,一是想表明倘不执住租界文化这个牛耳,海派文化之所以生、之所以盛,解释起来总觉难得要领;一是想把京、海派文化对峙的问题再引申开来,因为其中所隐含的奥秘,特别是从现代文化空间一改常态的深刻调整和历史现代转型中文化的应对方面看,还没有完全揭示出来。在我看来,这里面却正有着更富时代新意的历史内容和发人深思的意义存在。以租界文化的滋生源而形成的海派文化,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发展中是最具典范意义的现代都市文化,从历史现代性的角度看,它也是与其同向伴生并构成其文化性显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其必然性、进步性和文化发展现代性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及其对于历史承当的全面表征。文化的现代发展,不同于政治、经济,比较而言,情况是更为复杂的,不可仅据其与历史现代性同向性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断言其一切均为先进。事实上倒是,现

代政治、工商、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与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首先就是对人文文化的遮蔽与消解，这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更为突出。比如海派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伦理文化失范，工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浮华人生观念的弥漫，华洋杂糅中民族意识的淡漠等，就都是上海这一现代国际大都市形成过程中必然的然而负面的文化生成物。唯其如此，文化发展应对重大历史变革及其作为代价的人文缺失，常常是以正、逆两个方向互为制衡的结构性努力来承当对历史的期许的。所谓正者，即与历史变革顺向同构者，如现代之价值观念与人生观念、法理文化、科技文化、经营理念与管理文化等等，均属此类。而所谓“逆”者，即从相反的方向对历史变革及与其相符的一系列新的观念、文化进行制衡调控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文主义文化。这类文化直接与传统相接，其精神内核则直指人类几近于永恒的人道情怀与对天、地、人和谐关系的珍重。它对历史的责任期许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方面，那就是对新变革、新观念中人文精神遗落的补救，对难以避免所要发生的人性与历史的异化进行规约，保障人性与历史的健全发展。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京派在与海派的对峙中呈一时之盛的内在原因了。京派，即它的主要表现物——京派文学，其价值和意义主要就表现在它们是在面对日渐严重的文化的民族性和人文性危机时，在文坛上所作出的最为自觉也最具规模的对应性反应，它在维护人性健全发展和重塑民族品格的自我期许中，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传统中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障碍，在文学领域中开拓出一个阔大的人文主义的文化空间！这该是一种多么有意味、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呀，它的价值既在于文学，在于人文，也在于历史。

我所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过去大家比较关注于传播者的主体性差异，和不同的接受与传播线路在文化选择上的差异问题。比如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的在文化的接受上有何不同，他们归国后在文化立场和历史、文化变革的主张上又有怎样的区别，以及在国内历史形势的变动中其影响力的沉浮与变化等等。在中西文化的对接与域外异质性文化在中国如何传播的问题上，所做的研究也大多是停留在对归国者的译介文本和鼓动变革主张的评析上。但我想，这里似乎相对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上极其重要的前提，或者

说一个不可或缺的空间性中介,那就是由“租界文化”所支撑着的独特的文化空间。试想,如果没有租界这种中介性空间,中国整体上仍然是闭关自足的“王土”和大一统的文化禁锢,那些留学归来者的“异端”性宣教又怎么能够实现并逐渐为人们接受?所以说,重视这一对中国来说是前沿的,对中外两种文化来说是中介的特异文化空间的研究,对于深化研究中外文化的对接与传播,应当是十分必要的。

由阅读的兴奋而浮想联翩,不禁说了以上那么多话。但这适足以说明李永东博士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他于纷披的多种见解中独具慧眼地揭示出上述问题的关节所在——租界文化,并对它既统一又矛盾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新颖且符合历史实际。这就无异于打开了一道光束,照亮了为其关注的对象世界的角角落落。无论是对30年代文坛相关倾向的重新审视,还是对茅盾、沈从文、鲁迅等代表性作家创作变化原因的揭秘性阐释,无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胆有识,自成一家之言,实在难得。而且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亦有其明显可见的启发意义。至于书中的具体内容,精彩之处自多,读者诸君可以自己去看,于此不赘。

当然,为了维护所选价值视角的优先性和显现其聚焦能力,在对某些对象问题的阐释上略显简单或者偏至,尚有可再斟酌之处,但可贵的是作者在作这种阐释时即有了一种清醒,这又是其难得的可贵之处。

2006年8月9日

目 录

序	孔范今 1
导 论	1
第一章 租界与租界文化	12
第一节 租界历史的回溯和评述	12
第二节 租界文化的特征	24
第三节 “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兼论“海派”概念的困境	54
第二章 租界文化语境下 30 年代文学的特点	62
第一节 租界文本的殖民性透视	65
第二节 租界文化的商业性对 30 年代文学生产的规约	73
第三节 租界文化的颓废特征与文学的颓废叙事	79
第四节 在租界中寻求自然精神家园	86
第三章 租界文化对 30 年代文学现象的影响	91
第一节 租界文化语境下的左翼文学	93
第二节 洋场文人的租界感觉 ——新感觉派小说与租界文化	117
第三节 租界文化作为京派的“他者” ——从京海派论争来看	129
第四章 租界文化语境下矛盾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137
第一节 为人生的唯美—颓废观念	138
第二节 世纪末的颓废叙事	148
第三节 《子夜》所展示的租界生态图景	165

第五章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	172
第一节 租界生活与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嬗变	172
第二节 殖民叙事、文化身份与租界体验	186
第六章 鲁迅的租界体验与后期创作的嬗变	200
第一节 人与城的对话：鲁迅与租界化的上海	200
第二节 租界文化与鲁迅的后期创作：低落、迷失与趋附 ...	212
结 语	226
附录：中国租界基本情况一览表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2

导 论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唤起了人们对租界时期上海都市经验的缅怀,人们试图从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中,寻找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新时期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的巨大举措,在文化策略上选择“海派”作为上海的“城徽”。因此,新时期对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情关注,上海近现代文学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中心视野。

一、“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

在史学界,唐振常、熊月之、费成康等当代学者在上海史和租界史的研究上成效显著。他们与民国时期的姚公鹤、徐公肃、丘瑾璋、蒯世勋以及西方学者梅朋、傅立德、罗兹·墨非等的租界研究,都很注重历史的记录。租界的扩界、工部局的机构设置、租界司法权的演变、租界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是这些学者的论著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有少数史学家致力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天纲,从已有成果来看,海派文化、制度文化和城市文化是研究者选择的三个主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固然能够大致呈现近现代上海文化的本质属性,但是缺乏直指其文化内核的阐释力,也缺乏融括整体的气度。

在文学界,陈伯海、王文英、陈青生、袁进等分别对上海文学史进行了梳理。上海文学史的撰写基本上采用标准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以《上海现代文学史》为例,主编虽然独具慧眼地把曾在上海停留、居住,或在上海的报刊、出版社发表作品的作家都纳入上海文学的论述范围,然而,租界、租界文化的存在没有进入撰史者的中心视野。有学者指出:“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一把钥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

的一把钥匙”^①。我想,谈上海文学,不把租界及其文化作为思考的重要维度,不说有误读的危险,至少有所遮蔽。在海派文学(都市文学)的研究中,李欧梵、吴福辉、杨义、李今等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阅读《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上海摩登》和《京派海派综论》等研究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论述现代上海文学、海派文学和都市小说,研究者选取的文化视角绕不开“海派”。作为历史概念,“海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词汇,如果要把这个旧概念纳入新的研究框架,首先必须为之“正名”。当今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质”来命名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或者把海派文化归入都市文化范畴。沿用旧概念,对之重新解释,造成了新旧概念之间的断裂不说,还把海派文化投入到都市文化的怀抱中,并加以泛化。把经过如此修整后的“海派”概念投入文学研究,多少要承担概念偏执和错位带来的风险,这是当今研究者重新诠释和使用“海派”文化概念时难以摆脱的困境。“海派”概念的局限性,造成了使用过程中玩不转的现象,一些相关的问题无法在“海派”概念下得到合理解释,所以就不得不在同一专著中采取多种文化视角,把海派文化、都市文化、上海文化和洋场文化等概念交叉混杂使用,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的交叉混杂使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其中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能单独承担解释对象的重任,或者说都不是最贴近历史和文学本体的概念,必须提出新的文化概念来重新诠释与上海有关的文学现象。

上海文学、海派文学和都市文学研究,之所以存在一些解不开的症结,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忽略或者没有充分重视近现代上海最基本的文化语境——租界文化语境。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②。1930年,上海的总人口已达到30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48653亩,还不包括越界筑路的广阔区域。现在上海市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徐汇区所辖范围(旧县

① 陈旭麓:《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713页。

②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9页。

城所占地盘除外),以及虹口区和青浦区沿苏州河和黄浦江的广阔地界,在30年代几乎都属于租界领域。30年代上海的商贸、金融、工业和娱乐事业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

租界语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难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来准确全面地指称;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也不能对与上海有关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合理解释;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景观,也留下了一些盲点。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都与租界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这种联系是“捆绑式”的。我们可以发问:没有租界,相关的历史和文学现象会怎样发生呢?会是这样的历史情态吗?不论租界现象是民族的屈辱或现代中国的钥匙,我们都需要承认它存在的事实和培育出的独特文化形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考虑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新的文化概念,对与上海租界有关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解释。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我们提出“租界文化”概念。

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家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中国的租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从1843年到1902年,英、法、美、德、日、俄、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近30个租界。租界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中国租界存在的历史长,分布广,资料繁复,要全面考察所有租界的文化特性,就本书的写作来说,无疑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我们选择最典型、地位最重要的上海租界作为范例,来研究租界文化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所谓“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

面。随着百年租界现象的终结,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租界文化逐渐走向式微。

实际上,自设立租界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其孕育的怪异而令人深感不安的文化形态。由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固有的“乡土中国”文化立场或庙堂士大夫文化立场出发,认定租界文化是浅薄庸俗的,更由于当代研究者的历史或意识形态偏见,租界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被缩减,或被言说的禁忌所裁剪,人们无意于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梁遇春把黑暗的上海比喻成一条恶狗:“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①。周作人更是对上海文化充满鄙夷:“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②。钱锺书则认为上海能产生艺术和文化,简直是一个笑话,“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③。当今上海文化研究专家李天纲也坦言,“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④。对上海(租界)文化持鄙薄态度的论说,不胜枚举。这种评判态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租界文化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文化价值立场相冲突,故他们极力贬低租界文化,把租界当作文化沙漠。“对所谓‘文化沙漠’的批评,固然是指某地高品位的精神产品产出的匮乏,但更主要的,似乎是指城市所造就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准则”^⑤。租界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不合传统,又不合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面对租界时,难免有一

① 梁遇春:《猫狗》,《梁遇春散文》,吴福辉选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62页。

② 周作人:《上海气》,《语丝》,1927年1月1日,第112期,第264—265页。

③ 钱锺书:《猫》,《人·兽·鬼》,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1版,第20页。

④ 李天纲:《“海派”——近代市民文化之滥觞》,《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9页。

⑤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61页。

种“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的文化恐惧心理,恐惧心理的深层原因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笔者尊重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理解他们的文化姿态,但是,我们更需要直面历史的勇气和诠释文学史的求真态度。

租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是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条款相比,通商口岸的辟设和其后租界的建立,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现象。一方面,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的“桥头堡”,是帝国主义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飞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租界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体性存在,促成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崛起,形成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市政制度、文化出版机制和消费时尚,改变了租界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审美观念、伦理模式,并凭借其商业贸易网络、新闻传播体系、人口流动方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基本上属于外向型,现代知识分子是借西方观念来“煮自己的肉”。五四启蒙运动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而租界作为西方文化的集散地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是一种全方位的启蒙场域,租界提供的西方现代文明参照系具有自明性,租界运转中产生的各种人事景观和制造的各种观念性现实,为去国人乃至政体之“蔽”提供了具有说服力、启发性和现实效应的例证和机遇。租界是西方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入中国的缓冲地带,西方书籍和西方观念,几乎是通过上海、天津、武汉等租界城市大面积引进传播的,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和娱乐文化,如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汽车、电车、电影、留声机、跳舞场、咖啡馆等等,最初都是在租界区域出现,然后才推广到华界和内地城市。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①。租界提供了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现实语境,是中西文化交融和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租界的现代城市景观、生活方式和文化空间,为“现代性”提供了“实物样本”。因此,租界一方面参与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另一方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在启蒙主

①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第56—62页。

体、启蒙对象、思想资源、媒介传播、现实语境、政治环境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一石击起千重浪,和中国租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现代性因素也是有关系的。

根据 E. 希尔斯《论传统》^①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海租界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二三十年代应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型或文化传统,应该是成立的。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中的观点同样有助于我们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文明本身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今日如此横遭责难的那些细小变化,诸如离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贴面舞会的盛行,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事情,也许弹指之间就成了一种稍有差别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惯例,它们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时所具有的一样丰富的内容,同样的重要性,同样的价值”^②。租界文化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了惯例”,构成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的文化模式。否认其存在或讥笑其鄙陋者,多是怀有偏见的人。

二、租界文化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殖民文化的关系

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殖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租界是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的滋生地,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在核心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在上海,无论现代城市景观的出现、市民理性的形成、自由话语空间的提供、开放宽容意识的成熟、重商主义的流行、声光化电工业文明的发达,都和租界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些特征也被当作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30 年代的海派文化是上海开埠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海派”概念下的那些恶俗习气,大多数是租界风气所致。30 年代的中国都市文化与西方都市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都市进程是以沿海沿江的商埠、租界

① [美]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月第 1 版。

②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 5 月第 1 版,第 38 页。